

激荡与变革: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过程考

李传奇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 研究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以史料为基础探讨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过程。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前,国家体育组织机构曾经历了全国学界运动会、远东体育委员会、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等组织形式,基督教青年会在这些组织中居于领导地位。伴随当时国内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体育交流的需要,同时随着国人体育主权意识的觉醒,成立完全由国人自主的国家体育组织成为当时中国体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最终,在中华体育协会的推动以及国内体育界人士的团结合作下,具有广泛社会代表性、自主性、合法性的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7月5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内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标志着中国体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崭新阶段。

【关键词】 体育史; 国家体育组织; 中华体育协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远东体育委员会; 体育权

【中图分类号】 G8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5-0040-09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1110.001

2024年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100周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一方面,标志着国家体育主导权从基督教青年会手中回归到国人手中;另一方面,标志着功能相对完善的现代国家体育组织机构正式形成。一百年前,正值国内“反帝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勃兴的时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正是当时体育界对这些社会运动的积极回应。当前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成立后对中国体育发展的贡献方面^[1-3],对于体育协进会成立的过程还缺乏深入地研究。研究将以民间收藏资源、近代报刊史料为中心,立足于史料及相关文献,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历史背景、曲折过程进行全面考察,并对此过程中蕴含的各社会力量间的博弈进行探讨。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前国家体育组织的演变

1.1 “全国学界运动会”的登场

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

的主题,主权独立、功能完善的国家体育组织亦是其应有之意^[4],然而这一全国性体育组织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形成的进程,可见其大致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变革进而定型的历史过程。“全国学界运动会”恰恰可以理解为近代中国国家体育组织的起始点。

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8—22日,基督教青年会在南京组织筹办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First Chinese National Athletic Sport),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后来在民国时期被迫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5]。“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具体由美国人埃克斯纳(M.J.Exner)负责组织,而伍廷芳、唐绍仪、张伯苓、王正廷等人则在整个会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运动会召开过程中,“一切规则,悉仿美国”^[6]。运动会的举办与运转需要一个相关的组织机构进行协调和保障,虽然基督教青年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

收稿日期: 2023-9-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TY083)。

作者简介: 李传奇(1985—),男,江苏徐州人,博士生,研究方向: 体育的历史、文化与哲学。

着主体作用,但由于该运动会是全国范围的,具有国家性,所以必然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并在名称上与青年会有所区别的组织机构。按照194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史》一文所述“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在南京举行时,我国张伯苓、王正廷、伍廷芳、唐绍仪诸先生,始发起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是为我国有正式社会体育组织之始,亦即为该会之芽苗。……‘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纯系一种临时性之组织,故会毕以后,会员遂各自东西”^[7]。该记录将“全国学界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认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组织机构。然而如果立足于当时的文献,研究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关于“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是一个体育组织机构的相关论述。而当时西文的一些报道,均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作为运动会本身,翻译中强调“Sport”。比如,1910年,北华捷报印制的小册子明确印着“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假南洋劝业会场”及其英文翻译“First Chinese National Athletic Sport Held At The Nanyang Industrial Exposition”^[8]。

为探寻当时具体负责全国运动会召开的体育组织机构,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曾于2014年前后通过广泛搜集史料,最终认定暂设于青年会的“全国学界运动会”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即“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组织机构,其依据的史料是1912年日本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纂的《南京博览会各省出品调查书》。《南京博览会各省出品调查书》中将“全国学界运动会”与“教育研究会”“武备出品研究会”“报界俱进会”等并列,并明确了其暂设于青年会^[9]。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史料年代以及记录详情而得出的“全国学界运动会”为“最早的全国性体育组织”这一结论,具备一定的客观性。“全国学界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的举办不仅开创了近代中国全国运动会的历史,而且奠定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体育界随后10余年时间里的领导地位,而“全国学界运动会”的成立则预示着国家体育组织的萌芽。

1.2 隐而不显的“远东体育委员会”

之所以说远东体育委员会隐而不显,主要因为远东体育委员会留下的史料非常少,相关的研究也十分不足。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不同,远东体育

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拥有明确章程的社会团体,而更像一个围绕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和参与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权力集中而又相对封闭的体育决策圈子。伴随葛雷(J.H.Gray)信札的发现以及相关英语文献的梳理,远东体育委员会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的地位逐渐显露出来。

远东体育委员会其英文名称为“Far Eastern Contest Committee”^①,这是远东体育委员会在1924年时的电报抬头上的官方翻译。在更早时候,也叫“远东运动会中国委员会”,其翻译为“The Far Eastern Athletic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China”^②。远东体育委员会以“提倡中华民国之体育”为宗旨,其1925年的官方文件显示,该委员会中包括王正廷(会长)、张伯苓(副会长)、聂云台(会计)、刘福基(委员)、穆藕初(委员)、葛雷(名誉书记)。1925年,葛雷在《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Passing of the Far Eastern Contest Committee*(远东体育委员会的过去)的文章,由于葛雷长期担任远东体育委员会名誉书记的职务,对远东体育委员会的过去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这篇文章可认为是研究远东体育委员会最重要的文献。葛雷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了远东体育委员会的历史贡献,认为远东体育委员会在过去一直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和官方管理机构。“远东体育委员会是一个中国委员会……作为一个志愿组织成立于1912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其他可代表中国的体育组织),菲律宾群岛邀请中国和日本加入菲律宾群岛倡导的远东体育协会。曾经承担的责任,一直光荣地持续至今。在该委员会的努力下,中国曾六次参加这三个国家参与的远东运动会。……该委员会曾两次在中国举办远东运动会,同时成为远东体育协会的负责机构。委员会因此得名远东体育委员会,原委员会有伍廷芳、唐绍仪、聂云台、王正廷、张伯苓、克拉克担任名誉干事。后来,葛雷接替了克拉克,而其他五人中的三人一直留在委员会。如上所述,远东体育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完成他们被任命期间的比赛的各种任务。这些职责主要包括两部分:1.技术和组织层面: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和集结,以及必要的体育竞赛;2.财务:筹集和分配手头工作所需的资金。”^[10]从1912年成立到1925年,这一组织在中国存在了1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远东体育委员会逐渐退出了历

史的舞台。远东体育委员会在很多场合发挥着国家体育组织机构的功能,除了远东运动会的组织与参与,还包括筹划1917年在广东举办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②、报名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③,以及组织参加美国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④等。远东体育委员会同“全国学界运动会”一样,有着明显的基督教青年会背景,特别是其名誉书记,不管是克拉克还是葛雷,都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的干事,同时也都是该委员会的实际运作者和控制者。

1.3 名不副实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

当前,关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研究已有很多^[11-12],但对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实际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依然不足,尚需进一步挖掘史料进行深化。远东体育委员会,虽然是当时中国体育实际的权力决策和执行中心,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在组织结构和功能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成立一个能统一管理全国体育事业的组织依然是当时体育界所急需的事情。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著名的外籍体育专家麦克乐的积极推动下,一个借鉴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Amateur Athletic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组织形式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于1922年在北京成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宣言》中详细记述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成立过程,“民国八年(1919)在小吕宋举行第四次远东运动会的时候,中国赴会的执行委员,和其他有关系的人员,以为需要组织一个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于是在当时回国的时候,中国代表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编订草章,同年八月就把草章分寄国内外热心运动的各团体机关,十一月他们又在上海召集会议修改章程,以后又继续开会两次,到会的代表把章程修改了以后就通过,又举出来五个委员,把章程通知全国属于运动的各机关。民国十年(1921)六月四日,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各处提倡运动机关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会,到会的共有四十九人,因为时间短促,当时来不及逐条讨论章程,……各代表当时又选举临时职员共九人是:会长天津张伯苓,副会长南京郭秉文,会计北京袁敦礼,书记南京麦克乐,顾问香港刘福基,上海郝伯阳,北京马约翰,苏州司马德,保定柯兰克。……本年四月三日下午两点半钟在北京青年会的会所开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正式成立会。”^[13]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章程》中明确

了其作为国家体育组织的性质,并强调统一管理国内体育各项事业及国外体育交往事项。后来麦克乐由于时任的“国立东南大学”课务繁忙,没多久就辞去了名誉书记的职务,而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的主任葛雷继任。成立过程大体已经交待清楚,但有两个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

首先,当时中国体育发展的中心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而且在上海也召开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的议决会,那么为何最终会选择到北京去开成立大会?麦克乐给出的理由是“彼时正当春假,且值世界学生同盟会在京开会之期,届时全国各处学校必有诸多代表会集京师,因利乘便举行较易”^[14]。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世界学生同盟会”实际上指的是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显然麦克乐等希望利用这次会议的时机成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对内可以广泛号召争取会员,对外也可以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然而也正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引起了知识界普遍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以科学、民主为号召,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引领方向,对基督教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进而拉开了中国长达数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序幕,这也为日后国人收回体育权并成立自主管理的体育组织机构埋下了伏笔。其次,还有一个细节需要关注,那就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翻译问题。汤新铭^[15]认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英文名称为“China National Amateur Federation”,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并延用了这一英文名称,罗时铭^[16]也认同这种观点,但他们均没有注明具体的史料出处。而笔者所搜集的资料均显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英文翻译为“China Amateur Athletic Union”。例如,1919年起草的《中国业余运动联合会草章》中采用的英文翻译^[17]、1924年1月葛雷发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的英文信件中采用的翻译^⑤、1927年《大陆报》对葛雷的介绍“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名誉书记”所采用的翻译等^[18]。由此,可以确定“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英文翻译始终是“China Amateur Athletic Union”,而非“China National Amateur Federation”。

关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实际贡献和历史地位,名誉书记葛雷的观点比较客观,他在给中国网球

队报名参加1924年美国戴维斯杯网球赛时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的信中说,“在各种场合我们都对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进行了讨论,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个名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组织,我也担任该组织的名誉书记,但到目前为止,它基本上是一个不活跃的机构”^⑤,而在1925年回顾远东体育委员的文章中他也谈到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我们不断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完全负责任、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国家体育管理机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在几次尝试后成立的,但由于国家尚未做好准备,这些尝试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葛雷还同时担任“远东体育委员会”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名誉书记,不过相对而言,葛雷更看重“远东体育委员会”名誉书记这一职务,在其推动的各项体育事业中,也大多以“远东体育委员会”为官方机构,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仅在1924年武昌全国运动会发起时起到了名义上的作用,因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现实中“名不副实”,并未发挥其理想中的作用。

2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过程

2.1 远东运动会后的反思与筹划成立中华体育协会

1923年5月21—26日,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葛雷为中国方面的总干事,全权负责中国队的参赛事务。在远东运动会开始前的一个多月,国内就是否出席本届远东运动会陷入了争论。争论源自中日矛盾的爆发,1923年3月14日,日本拒绝了中国政府收回旅顺、大连的照会,全国各地商人团体奋起反抗,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以经济绝交的办法来抗议日本,上海商界也于3月25日晚正式做出抵制日货的决议^[19]。针对即将举办的大阪远东运动会,1923年4月6日,上海商总联会认为派团赴远东运动会“迹近表示亲善,与经济绝交方面大相违背,决定函致省教育会及学生联合会劝告停止赴远东运动会”^[20]。此论得到了上海社会各界的众多响应,葛雷筹划参加大阪远东运动会的工作顿时变得非常被动。于是在4月12日,葛雷专门在《申报》上刊文,认为中国不应退出这届远东运动会,并提出“此次运动会乃属于国际的,而非专属两国的,盖中国加入友谊的绅士条约,为远东运动联合会及世界奥灵匹克运动会(注:今译“奥林匹克运动会”)

之一份子,直接参加远东各国之体育比赛,亦即间接与西方诸国相角胜,此次运动会即此国际盟约之一部分,并非中日两国间之比赛,倘中国退出此会,将丧失其国际体育上之地位,而有妨中国青年运动对于体育方面之发展”等6条理由^[21]。最终,中国虽然参加了这届远东运动会,但因准备仓促加上经济条件拮据,并没有取得优异的成绩,7项正式项目中仅足球得了第一名。再加上葛雷在远东运动会时以中国代表的身份登台讲话,引起了运动员、旅日侨胞强烈不满。因此,在反帝爱国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以及远东运动会失利的大背景下,国人开始了对中国体育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其未来发展的筹划。

1923年6月6日,上海时报馆召开了一次集报界人士、基督教青年会人士、体育界人士为主的座谈会,出席的人士有杜荣棠、戈公振、刘福基、沈嗣良、高梓、郝伯阳、张天培等10余人。会上诸多人士对远东运动会的失利展开了反思,并对葛雷在远东运动会时的表现提出了批评。华南代表刘福基认为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失败的原因可归为3个方面,其一,“中国选手平时无联络之机会,……欲求以后不失败,当组织一全国体育协会,从事联络,每年举行大会,讨论体育上之进行事宜”;其二,社会和政府不重视体育,在资金的资助上匮乏;其三,时间上准备仓促,没有做好足够的赛前准备工作。田径名将杜荣棠认为,“此次所受刺激最大者,即在以西人为中国选手之领袖呈留日学生及各选手,对之均不满意,……赴日后,一切会集,均由葛雷博士为代表,中国为独立国家,乃至以西人为领袖,有损国体,孰甚于此乎,为今计,惟有集合全国体育界,通力合作,方能受桑榆之效”。女青年会的干事袁保珠认为参与远东运动会“宜用华人为领袖”。上海青年会的郝伯阳也强调,“由华人自起组织体育会,办理中国体育进行事宜及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已为刻下及不容缓之事”,另外,沈嗣良、戈公振、高梓等与会人员均极力赞同“组织一体育会,以资联络全国体育界”^[22]。可以说,这次座谈会的举办揭开了我国成立自主的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序幕。

时报馆的座谈会经报刊的报道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戈公振、马子贞、唐少川、熊长卿、卢炜昌、高梓、陈公哲、郝伯阳、王壮飞、杜荣棠等10人发起成立中华体育协会。并于

1923年7月7日,在上海四马路岭南楼举行筹备会议,公决先设筹备处于北四川路福德里中央大会堂,并推举唐少川、马子贞、沈信卿、郝伯阳、戈公振、卢炜昌、熊长卿、陈公哲、侯可九、王壮飞、马西民、吴志青、贾季英、曹慕管、沈卓吾、裴国雄、张德平、余孟阳、张国勋、唐豪等20人为筹备委员,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马西民、裴国雄等7人为筹备会执行委员。会上“对于组织中华体育协会均一致赞同,讨论多时,旋议决用中华体育协会名义进行联络华南、华北、华东、华中各体育会,定期举行成立大会”^[23]。值得注意的是,在10位发起人中,唐少川、熊长卿、卢炜昌、陈公哲均为在沪的广东人;马子贞、熊长卿、卢炜昌、陈公哲则在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卢炜昌、陈公哲又是精武体育会的实际领导者;而唐少川即唐绍仪,曾担任远东体育委员会的会长,是早期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的重要组织者;另外,唐少川、郝伯阳、高梓三人又具有深厚的基督教青年会背景。10位发起人中在沪广东籍人士占了近半,一定程度上容易统一思想、达成共识。而以精武体育会为代表的武术界人士的参与,则是民族主义勃兴在体育界的反应,武术作为具有民族性的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武术界人士期望通过重塑国家体育组织机构来实现武术的传播与繁荣。唐少川、郝伯阳、高梓等具有深厚基督教青年会背景人士的参与,则反应了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内部对于外籍干事专断行为的不满。筹备处所在地北四川路福德里中央大会堂,实际上正是上海精武体育会总部所在地,这也就使得当时精武体育会的主事者卢炜昌、陈公哲,特别是卢炜昌,掌握了中华体育协会成立过程中的实际主导权。

中华体育协会的成立过程非常曲折,《申报》1923年9月16日的报道中提到“该会已分函各省青年会体育部,请为调查当地体育机关以便联络进行,刻已接到复函者汉口、济南、太原等处,前日下午八时举行执行委员之筹备会议,讨论进行方针,议决定于十月六日(本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举行成立大会,地点尚未定”^[24]。后来由于场地没有协调好,最终成立大会改到10月7日在斜桥公共体育场举行。当天出席会议的有40余人,其中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葛雷,然而由于各团体代表没有到齐,再加上意见并不统一,所以最终成立会

又改成了筹备会,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上并没有发现精武体育会卢炜昌和陈公哲的名字。此后直至1924年2月25日,“曾举行多次会议,后因卢炜昌作南洋之游,故此事暂告终止,现卢君不日即将返沪,将与其他诸人商洽,拟乘全国运动大会在武昌开会之便,举行成立大会”^[25],并召集各界人士于3月24日准备在中央大会堂召集谈话会。在这一阶段由于种种缘故,中华体育协会虽然最终没有能成立,但筹备过程中各种通知的发布以及数次会议的召开,也逐渐扩大了中华体育协会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并形成了诸多共识,刊发了《中华体育协会宣言》《中华体育协会简章》等。在《中华体育协会简章》中,“名称”确定为“中华体育协会”(China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并提出以“奖励及指导国民之体育增进国民之体力为宗旨”,业务方面概况为“(一)关于体育之训练及指导(二)关于体育之调查及研究(三)主持国内之运动会(四)主持国际之运动会(五)体育印刷品之刊布及体育消息之宣传”,在“职权”条目中,规定“本会对于会员有下列各项运动之管理权:国技,球类,田径赛,游泳,器械运动”^[26]。《中华体育协会简章》相较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简章》,从内容上来看简单了一些,但首次将“国技”明确纳入了全国体育组织机构的管理之中,并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中华体育协会要成为真正的国家体育组织机构,就必须得到全国范围内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而第三届武昌全国运动大会的召开,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借此可以广泛的宣传和动员,进而获得认同和支持^[27]。

2.2 全国运动会时中华体育协会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在精武体育会卢炜昌的主导下,中华体育协会准备于1924年5月在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时召开成立大会。中华体育协会虽然还没有正式成立,但其前期的筹备与宣传,使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在本届全运会召开前的“抵制风波”中已经有深刻的体现。

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以及1914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均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导举办,并得到了政府一定程度上的认可。由于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至1923年全国运动会已经中断了近九年时间。1923年12月8日,《申报》刊发了一篇《全国联

合运动会之先声》的报道,报道中明确指出,“近据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名誉书记葛雷博士宣称,全国联合运动会将于明年五月间在湖北武昌举行。……又闻葛雷博士将于耶稣圣诞节后赴汉口,作最后之磋商,此后详细组织情形,可以宣布,博士近于南游时,已与广州、香港、汕头、厦门、福州等处之体育领袖接洽,故开全国联合运动会时,该处将派运动员参与云”,其中也强调了本次全国运动会是由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议定并发起的^[28]。同时从上述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次全国运动会的实际筹备和主持者为葛雷,运动会的报名处也设在了葛雷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博物馆路20号。

到了1924年4月份,反对和抵制全国运动会的声音开始出现。南华体育会、湖北商团均致函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表示质疑这届全国运动会的合法性,并主张联合国内各团体进行抵制。南华体育会在函中讲到,“该中华业余运动会之值□,究在何时何人举出,是否有此权能,以核定进行此全国运动大会,以内容考之,全属远东运动会人员之变相,如办全国运动大会须由该会核定方得举行,则全国体育总机关自必为该会矣。闻贵会亦将派员往武昌与会,并拟趁此时机召集各地代表举行成立大会,敝会以情形测之,窃不能部位贵会虑也……莫若联合各体育团体不与斯会,宣布其组织不合法,并否认其为全国总机关。另发表贵会之宗旨及召集各处代表赴会,联合组织,至于成立,以示公开,苟当贵会召集代表叙会时,弊会谨当派员与会云云。”^[29]中华体育协会也在复函中改变了积极参会的态度,并表示不与参会。抵制的声音日益强大,武昌全国运动会能否顺利举办,面临着巨大的变数。武昌方面立即发文进行解释,“业余运动会不过为发起者之一,一切组织俱系临时所举出,领袖均属全国名流,葛雷博士不过一报名之经理者,敝会迭次通告旨趣办法,言之甚详,此次务为超政治、超宗教、超越一切,而为极纯洁之运动会。筹备人员,凡精武会、青年会以及各界,均在其列,会期以后,中华体育协会将在鄂组织正式成立大会,以后只全国运动会及远东运动会为主要之机关,在国内国际均足以发扬国光。”^[30]另外,圣约翰大学体育教员蒋湘青也致函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认为应当加入武昌全国运动会,“此次全国运动会,绝不能因葛雷一人之关系即加以反对,当从积极

方面,另谋补救方法……至于反对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核定进行,敝人亦表同情,但因反对该会而不参与比赛,窃以为绝对不可,个人意见主张国内各大体育会彼此联络,致函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请其取消主持本届全国运动会名义,而由武昌筹备处负责主持,待大会闭幕,即在武昌召集各部体育领袖讨论组织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中华体育协会办理以后国内外运动事宜云云。”^[31]不管是武昌方面的来函,还是蒋湘青的来函,均强调了中华体育协会取代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作为未来中国体育总机关的主张。由此,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开始转变过去抵制的态度,登报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同时号召全国各体育团体前去武汉参加中华体育协会的成立大会。至此,关于抵制武昌全国运动会的风波平息了下来。

然而,中华体育协会在武昌的成立大会召开的并不顺利。1924年5月22日在武昌体育场钟楼开发起会时,由于人数不多,无结果而散会。25日在湖北省教育厅正式开会时,出席会议的有7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会长张伯苓先生。会上杜荣棠与戈公振报告了中华体育协会的发起经过和章程等相关情况,张伯苓也报告了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相关情况并主张中华体育协会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合作。对于该主张除小部分持否定态度外,大多数赞成,然而在讨论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一面,“全场秩序大乱,几至动武,后由张伯苓起立喝止”。由于讨论没有结果,与会人员一致主张下午在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开会时继续讨论。当天下午的会议,葛雷、麦克乐等均有出席,加上中华体育协会各省代表共80余人,会上张伯苓在反思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不足时说道,“余以事忙未负责,致使会务进行甚迟,后有加入远东运动会之选手由日返国,告余对业余运动会之不满情形,余闻而颇惭,幸业余运动会本属临时组织,可随时取消,余亦愿引退,非余无志提倡体育,实因惮见无意之争论。”会中,“卢炜昌起立,谓中华业余运动会所以急需改组,因内众信宗教者太多,最易使人误会。张答曰,会中办事者,非尽系基督徒,且真正之基督徒,决无攘夺权位之行为,苟有之,余亦必辞退。卢谓我等因信任张先生,故请张先生仍需继任,张又答曰,以前余任业余运动会之职员为临时,今有正式组织,理当

引退。”^[32]显然卢炜昌与张伯苓在观念上是有矛盾的,而这种矛盾无疑与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存在关系,然而卢炜昌在与张伯苓的讨论中,忽略了“国人自主”这一具有号召力的根本理念,而是强调“信宗教者太多”,这无疑会激发体育团体内部的矛盾,也凸显了卢炜昌思想的局限性。在这场大会中,随后更多的代表发表意见,最终在众说纷纭中,由于无法形成统一意见,中华体育协会的成立又落空了。不过大家也达成了一项共识,就是推举张伯苓、卢炜昌2人为委员长,遴选5位委员(聂云台、郝伯阳、柳伯英、沈嗣良、王壮飞)修改章程,到7月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时,再召集各省代表召开成立大会。

中华体育协会成立的初衷是要取代而非重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合法的、独立的、国人自主管理的国家体育总机关,但是,中华体育协会主要组织者的自身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足以支撑起这一初衷。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委员,比如张伯苓、郭秉文、袁敦礼、葛雷等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中华体育协会也必然无法有效运转。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合法性被社会各界广泛质疑的情况下,其已经无法继续运转,因此出于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前途的考量,中华体育协会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之间必然需要在冲突中达成妥协的合作方案。虽然中华体育协会最终做了一定的妥协,但可以看出主导“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成立的人员依然以中华体育协会的发起人员为主体。

2.3 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

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1年在北京成立,由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杂志社和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合并组成,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界在形式上统一的象征”^[33]。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34],会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总事务所下设32个学术委员会,其中就包括体育与国民游戏委员会,范源濂、张伯苓、郭秉文、李建勋、熊希龄、蔡元培、黄炎培等皆为该社第一届董事,可以说中华教育改进社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年会,顾名思义每年举办一次,即全体大会,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最高权力及决策事务大会。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召开期间成立国人自主的

“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不管是合法性、正统性还是社会基础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关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过程,《申报》做了详细的报道。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的具体名称在成立大会上是存在争议的,基本经历了从“中华体育联合会”到“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再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过程。在1924年7月4日的召开的会议中,“‘定名’原为‘中华体育联合会’,因有人主张用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者,有主张用中华体育促进会者,有主张用中华体育协进会者,讨论良久,颇难解决,后由麦克乐提议将第一条‘定名’移后讨论,以省时间,胡宣明附议,表决通过”^[35],到了7月5日的会议时,“对于会名,亦作一度之讨论,各董事均主张用‘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九字”^[35]。而后来又最终确定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一名称,则是在7月5日的晚上,作为重要参与者的蒋湘青有具体的记载,“当他产生那一天的晚上,就由董事部替他题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36]。

1924年7月4日下午8点,在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共有来自10省份的代表65人,会上公推张伯苓为主席,沈嗣良为临时书记,该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章程》中所涉及的“定名”“宗旨”“组织”“行政”“评议部之责权”“执行部之责权”“本章程之修改”等条款分别进行讨论和表决。对于当天的会议《申报》的评价是“时,秩序尚可,此次似有成立希望”^[35]。7月5日下午4点,“中华体育联合会”继续在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开始后,即有张伯苓作报告,张伯苓特别强调“谓为时间经济起见,诸位说话时务求精要,勿多发议论,盖会章不过一纸空文,最重要者,为将来实际之做事”^[37],张伯苓的定调使得会议顺利了很多,“是日秩序甚佳,绝无争执”,各位代表也深知“此次若不成立,再无人敢发起此会,即有人发起,恐亦无人再愿与会”。最终,在讨论了组织架构问题后,大会选举张伯苓(32票)、郭秉文(31票)、陈时(29票)、卢炜昌(23票)、聂云台(22票)、郝伯阳(22票)、沈嗣良(18票)、方克刚(14票)、穆藕初(12票)等9人为董事,执行总干事则由圣约翰大学体育主任沈嗣良担任。随后,张伯苓宣布“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正

式成立。至此,经过“中华体育协会”的发起,再到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合作,最终国人期待已久的具有自主性的“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终于正式成立了。正如蒋湘青所言,“这个会的成立,是我们体育界的同志,也是我们全国的国民,宣传奔走,努力合作的结果,……中国事应当由中国人办,发起组织本会的动机,就是为了这一句话。”^[36]1925年10月29日,张伯苓正式向北洋政府内务部呈交了《为创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请注册案由》,以获得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另外,在1923—1926年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被国际奥委会确认为中国的奥委会^[38]。

3 结语

晚清至1920年代早期,基督教青年会是这一阶段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全国运动大会的举办、远东运动会的组织与参与均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导力量,全国学界运动会、远东体育委员会、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等具有国家性的体育组织机构也均由基督教青年会管理和控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勃兴,“非基督教运动”的进行,收回教育权运动开展,国人的体育主权意识开始觉醒。成立由国人自行管理的国家体育总机关,成为当时体育人共同的梦想和努力的目标。中华体育协会的呐喊与积极筹划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而中华体育协会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合作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过程虽然曲折而艰难,但最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努力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7月5日在南京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中国体育主权的回归,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成为推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导者,对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不仅积极发展国内各项体育事业,诸如拓展基层体育组织、规范体育赛事、推广运动项目、培养体育人才等;对外代表中国积极参与远东运动会、美国戴维斯杯网球公开赛、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体育赛事,极大的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

注释:

① Gray to Sir, 1924-11-15.这封信札的内容是葛雷介绍远东

体育委员会所管理的相关场地设施情况的,所使用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官方信纸,信纸上不仅有远东体育委员会的中英文书写,还有远东体育委员会的宗旨“提倡中华国民之体育”,以及委员介绍,通讯处等信息,该信札对于研究远东体育委员会具有基础性价值。

② The Far Eastern Athletic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China to Chu Ching Lan, 1917-7-31.这封电报抬头即显示了远东运动会中国委员会及其英文翻译,同时显示该委员会委员的具体信息,包括唐绍仪(会长),聂云台(司库),张伯苓,刘铸伯,周诒春,柯乐克(义务干事),电报内容主要为远东体育委员会商办在广东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事宜。

③ Gray to Paris, 1924-4-28.该电报是葛雷以远东体育委员会名义发给1924年巴黎奥组委的,内容是为中国网球运动员报名参加网球项目的单打和双打比赛,值得注意的是该电报的抬头部分印着“National Committe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④ Gray to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 1924-2-11.这封信札是葛雷发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的,内容为中国报名参加美国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

⑤ Gray to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 1924-2-12.这封信札是葛雷写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的,内容主要介绍了中国的体育管理机构的现状以及报名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中国网球运动员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 陈明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 [2] 刘仲豪,邓星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的构建[J].体育学刊,2021,28(3):25-30.
- [3] 柯火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研究(1924-1949)[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 [4] 刘兵,郑志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与发展[J/OL].体育学研究:1-16[2023-11-08].
<https://doi.org/10.15877/j.cnki.nsic.20231020.001>.
- [5]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M].上海:朱锦堂印刷所,1927.
- [6] 教会新闻[N].通问报,1910,416.
- [7]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干事部.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M].上海,1948.
- [8] 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N].North-China Daily New,1910.
- [9]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百年缘——近代现代南京与奥林匹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 [10] GRAY.Passing of the Far Eastern Contest Committee[N].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5-10-6(5).
- [11] 张弓.“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解体于何时?[J].体育文史,1991(4):48-49.
- [12] 谷世权.“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前后[J].体育文史,1991(2):39-41.
- [13]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宣言[J].体育季刊,1922(1):1-4.
- [14] 麦克乐.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会预告[N].时报,1922-2-23.
- [15] 汤铭新.我国参加奥运沧桑史——中国奥会与远运、奥运之渊源[M].台北: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印行,1999.
- [16] 罗时铭.民国时期中国最早加入国际奥委会时间求证[J].体育文化导刊,2018(7):127-131,143.

- [17] 中国业余运动联合会草章(中英文对照)[J].英文杂志.1920(6): 455-464.
- [18] CHANG K S.Man Who Laid Cornerstone For Olympic Body And N.A.A.F Sees Great Future Here For Sports On Eve Of Departure[N].the China press,1927-7-1(5).
- [19] 于文浩.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博弈——以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6(10): 139-145.
- [20] 商总联会所接对日运动函件.申报[N].1923-4-6.
- [21] 葛雷对于远东运动会之意见.申报[N].1923-4-12.
- [22] 华人自组体育机关之先声.时报[N].1923-6-7.
- [23] 中华体育协会昨开筹备会.申报[N].1923-7-8.
- [24] 中华体育协会定期成立.申报[N].1923-9-16.
- [25] 中华体育协会将开成立会.申报[N].1924-2-25.
- [26] 中华体育协会宣言[J].中央,1923(29): 40-43.
- [27] 崔乐泉,郭荣娟.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J].体育学研究,2019,2(2): 15-22.
- [28] 全国联合运动会之先声.申报[N].1923-12-8.
- [29] 全国运动会之反对声.申报[N].1924-4-20.
- [30] 全国运动会解释筹备情形.申报[N].1924-4-28.
- [31] 主张参与全国运动会之意见.申报[N].1924-4-30.
- [32] 体育协会在鄂开会之经过 为与业余会合并事.申报[N].1924-5-30.
- [33] 杨卫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对象的考察[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32(6): 66-69.
- [34] 中华教育改进社缘起及章程.新教育[J],1922(3): 344.
- [35] 中华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纪.申报[N].1924-7-6.
- [36] 蒋湘青.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的态度[J].教育与人生,1924(39): 11.
- [37] 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申报[N].1924-7-7.
- [38] 李传奇.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J].体育学刊,2023,30(1): 30.

Agi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ment of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LI Chuanq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the 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 had gone through various organizational forms such as the National School Sports Organization, the Far Eastern Contest Committee, and the China Amateur Athletic Union, among which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held a leading pos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need for foreign sports exchanges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 awakening of Chinese people's awareness of sports sovereignt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 completely made and run by Chinese people beca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at that time. Finally,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a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 and the unity and cooperation of domestic sports professionals, the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which has broad social representation, autonomy, and legitimacy,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on July 5, 1924 in the Chemistry Classroom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marking a new stage of aut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China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Far Eastern Contest Committee; sports rights